

# 网络的生产

——以一个地方性黑市经济的演化为关键案例

唐 丽

**Abstract:** The article chooses an underground economical group of counterfeited cigarette in Zengcun, a country in Hebei Province, as a critical case and tries to analyze some theories about social network, especially those questions never be studied deeply before, such as how to build or maintain social network. Some main points can be generalized as follows: social network has its base and limit—things and any changes of things will transfer the size of social network. So social network in economic life is actually a whole dynamic process including building expanding and shrinking.

## 一、引 子

当老齐美尔于 1922 年似乎在不经意之间写下“网络”(network)一词的时候(齐美尔, 1922), 他断乎不会想到, 在大约 50 年之后, 以这个字眼为基础的社会网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竟会演化成社会学中的一个主导性分支, 甚至对某些相邻学科如政治理论、人类学和组织分析等等, 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就技术而言, 社会网分析引进了数学的图论作为基础, 并且广泛利用了日新月异的计算机技术作为统计分析的辅助手段。这就使得社会网分析极大地扩大了它的探索能力, 使它的触角从初期的小群体范围拓展到对社区、组织等社会生活的大规模单元。

就理论而言, 社会网分析也为社会学家提供了观察社会生活的一个深刻视角。如果说, 社会学观察社会生活的重心在于“社会结构”的话, 那么, 这也正是社会网分析的着力之处。通过将“网点”(node)、“密度”(density)等一系列概念引进分析框架, 社会网分析至少是在试图厘清“社会结构”概念的含义, 将百余年来社会学家附着在这个核心概念上的多元歧义归于一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学界不乏论者对社会网分析抱持一种高度乐观主义的态度, 甚至将之称为“社会学的新古典革命”(肖鸿, 1999: 10)。

特别是在 1980 年前后, 随着一大批社会学家以社会网分析为手段, 介入对经济现象的研究和分析(R. Swedberg, 1987: 21), 社会学从一个新的起点开始了与经济学之间的对话。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社会网分析与近年来日益彰显出重要性的另外一个社会学概念——“社会资本”密切地关联在一起。社会资本概念的出现和向经济生活领域的广泛介入和使用, 为美国社会学注入了新的理论关怀焦点, 而社会网分析方法又为对社会资本在经济生活和其他各种社会生活领域内的运作进行分析提供了定量测度手段。两相结合, 一切都那样完美。一批相关研究应运而生(例如, 参见 M. Granovetter, 1973, 1974; R. Burt, 1983, 1992; Lin Nan, 1982), 也似乎昭示着在帕森斯主义的一统天下崩解以后, 美国社会学告别消沉时代和再度繁荣与复兴。然而, 也正是在在这一过程中, 一个对于社会网分析和社会资本理论来说都是不容回避的难题却悄悄地衍生出来: 社会网络(或者是变形为社会资本的网络)从何而来? 对于这个问题, 似乎大部分社会网分析者和社会资本理论的倡导者, 都未曾给予充分的留意。

无论是网络分析的大人物(格拉诺维特, 他似乎从来没有使用过“社会资本”这个概念), 还是社会资本理论的倡导者(科尔曼, 他的分析中总是混用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 甚至是最后实现了将社会网分析

和社会资本理论熔于一炉的奠基人(林南,他虽然抱怨说,为社会资本下定义是一个“颇费周折”的工作,但还是用社会网络定义了社会资本),他们无不把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当作某种现存的东西来看待,而关于网络如何生产和建构的问题,最终落在这些大人物的视野以外,没有被纳入到主流研究项目中来。由此产生的难题和困惑是:

首先,在理论上掉入“片面化陷阱”的危险。泽立则尔(V. Zelizer)曾经嘲笑格拉诺维特为“网络绝对主义者”(R. Swedberg, 1987)。因为虽然格拉诺维特要求人们研究“活生生的社会关系”(ongoing relationships)(Granovetter, 1985: 483),但却由于眼界的狭隘而支解了这种关系——限于现成关系的运作。这种片面的眼光,抹煞了观察生生不息的社会网络关系,特别是网络生产过程的可能性。实际上,这种“网络绝对主义”的局限性也正在日益显露出来。正如一位学者所分析的,人们越来越重视研究现存关系的形式,而不再分析关系的实质;越来越热衷于发展更精巧的数学技术、数理模型和图表符号来描述假设成分越来越多的网络结构,而不断地远离社会现实(肖鸿, 1999: 9)。

其次,与人们日常生活经验不符。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要面对几乎是无穷无尽的链条的可能性,做出不同的决策。如果某些这类决策要依据社会关系(或社会资本)而做出的话,那么这些社会关系就必须是活泼的,而不是僵死的。任何人根据自己的生活常识都可以做出判断:在日常生活中,现有的社会关系只能应付很少的情境需求,大量碰到的是未知的情境,需要的是寻找和确立尚未存在的社会关系。

当然,当下的理论主流对社会关系网络的生成或建构过程问题的相对忽视,并不意味着社会学界绝对未曾尝试过这方面的研究。毕竟有一些研究者从这样那样的角度,程度不同地涉及过这个问题,即便是前文“批判”过的在总体上忽略过此问题的社会学家们,在某些细节上也还是颇有见地的。对此需要加以简略回顾。

1. 格拉诺维特在探讨人们如何利用人际关系找到工作时认为,要对人际关系的使用做明晰的分类,就必须厘清两类不同的关系:一是正在求职的人和可能帮助他的熟人之间主要有哪些典型的关系存在;二是这些熟人又是通过何种途径而获悉某些有用的工作信息的。对于第一个问题,格拉诺维特认为关系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家庭—社会”型关系(family-social contact)和“工作型关系”(a person known from a work situation),另外对于工作搜寻者和熟人的交往情况,格拉诺维特也做了描述:16.7%的求职者与他们的熟人在找工作时经常见面,55.6%偶尔见面,27.8%很少见面(Granovetter, 1974: 50)。在这里,区分不同的关系类型及其作用的思想被比较明白地提了出来。

2. 博特和林南也都从各自的角度触及了网络生产问题。博特认为社会网络就是一种社会资本。资本蕴含着投资和回报。那么,社会资本就意味着人们需要有意于关系网络从而得到回报。既然作为一种投资,需要考虑的问题即是如何使网络更有效率。博特认为,不重复的信息源也就是所谓的“结构洞”是最有效率的(R. Burt, 1992: 9),而这需要人们用心经营。林南则引用了一句俗语:“重要的不是你做什么,而是你认识谁”(Lin, 2001: 24)来说明营造网络的重要性。为了建立“正确的”人际关系就需要有所投入(investment):“本质上,资本是一种剩余价值并且代表着一种预期获得回报的投入。关于社会资本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它其实是预期获得某种回报的对社会关系的投入”(Lin, 2001: 24)。在这里,社会关系同样也需要经营、运作的思想,甚至其经营、运作也需要成本的思想,得到了某种表达。

3. 索罗森(Olav Sorenson)和斯图亚特(Toby E. Stuart)以美国风险投资公司为例,论述了公司之间关系网络的建构对投资空间分布的影响。有很多观察家发现,先进的通讯技术和交通手段出人意料地竟未能真正改变风险投资趋于地理性集中(Spatial concentration)或行业性集中(Industry concentration)的布局。索罗森等认为,这是因为社会关系网络在地域内和行业内设置了一条内在的边界,限制了信息的传递。由于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嵌入在市场交易双方之间的强关系取代了在传递异质信息方面发挥作用的大众传媒和弱关系,在风险投资的空间取向中成为关键因素。因此,建构不同性质的关系网络就会有不同的投资空间布局。在该篇文章中,索罗森和斯图亚特认为:以往的研究关注了空间、距离这些地形方面的因素对于人际关系形成的影响,这些关系主要是友谊、婚姻之类,他们主张这种

情形也可推演至经济交换关系(Olav Sorenson & Toby E. Stuart, 2001: 1588)。

4. 另外还有一些关于关系网络生产的更为直接的研究,比如杨美惠对于当代中国大陆“人情”、“关系”的敏锐观察以及白春燕对于民间企业家生产及再生产社会资本的分析等。杨美惠认为,关系学就是关系的艺术(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也就是如何与对方建立“关系”,交换礼物得到利益,并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关系网(Mayhui Yang, 1994)。白春燕则在研究中发现民间企业家在创业、资本积累和资本积累成功后的不同时期,分别通过不固定的礼物、金钱、固定的工薪、股份以及对社区承担责任等来换得支持和保护(白春燕, 2000: 15)。

由上可见,涉及到网络建构或生产的问题,某些研究者已有所触及。当然,其中有些论述是从个人行动者的角度出发,而另外一些论述则是从法人行动者的角度出发的。但在这些论述中,却存在一个共同的、重要的难点:缺乏关键个案的研究。他们所研究的,不是个人在某种常规制度安排下的活动(如,求职),即是某个经济组织在制度框架的保护下的活动(如,投资公司建构客户网络)。在这里,建网的行动者,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机构,都并非处在与外部制度环境相对抗的地位上。换言之,正式制度的存在业已为他(它)们的活动提供了基本的空间,社会网络的运用只不过使其行动进行得更为顺畅而已,它并不是该行动必不可少的首要前提。没有了社会网络,人照样可以通过职业介绍所,甚至通过在报纸和各种媒体上刊载的广告而找到工作,而风险投资公司则可以通过调查客户的业绩,建立正规的投资市场等等来确定投资的方向。在这种情形下,个人或组织决不会因为欠缺社会网络而归于死灭,也就是说,社会网络很难从制度中真正抽离出来。

因此,基于这样的案例来分析社会网络的生成,要想真正查见事情的底蕴,可谓困难重重。网络生成的诸般细节以及维持网络的各种机制,都很难透过对这类歧义颇多,或者说“典型意义”不够的案例解析而得到充分暴露。可见,涉及到网络生产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说,问题最终就归结为:为了深入探讨网络的生成机制,我们需要一个关键个案(critical case)。

与那些铺天盖地的一般个案研究不同,“在关键(或理论)的个案研究中,研究者出于进行详尽经验分析的目的,精心挑选出案例,而该案例能够为解析迷团和矛盾提供特殊的焦点……一系列不同的数据收集技术都可以运用于关键的个案研究之中……所以,关键的个案研究提出抽象的理论观念,并且依据社会实践来结构(或验证)这些观念,并且诠释它们是如何依据社会总体而运转的……最为关键的是:批判的社会研究者使用关键的个案研究,旨在诠释更为广泛的社会结构和历史问题”(Harvey Lee, 1990: 202)。

出于对上述要求的考虑,本文选择了一个从事地下经济活动的关系网络作为关键案例。

“地下经济”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吉奥泽(Giorgio Fua)1977年首次提出的概念,是指因各种原因未向政府申报收入,政府无法实施控制和税收管理,其产值又未纳入政府公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那部分经济活动。它包括:未统计的有益经济;借合法经营形式谋取非法收入的经济活动;无视和违反国家经济政策法规的非法经营和黑市交易活动;国家明令禁止的非法经营活动等(万安培, 1994: 14)。

本文特别关注的是第三层含义上的地下经济,即无视和违反国家经济政策法规的非法经营和黑市交易活动。

由于不受正式制度的保护,无法在正式制度所提供的合法空间中运作,这就决定了地下经济必定要依靠关系网络来运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地下经济从酝酿、生成到发育成型,都是和社会关系网络息息相关的。没有社会网,就不会有地下经济的存在和发展。<sup>①</sup>

由此可以推断:若以地下经济为入手点,我们就可以比较深入地追寻、发现一个网络由点及面的全

<sup>①</sup> 正是因为地下经济下的关系网络和正式制度在目标上存在的互斥,使得网络从制度中的抽离成为可能。但这并不是否定了两者之间的互动,相反,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网络和制度更为密切相关,只不过网络不再是达成制度所求目标的手段,而是与之背道而驰。网络与制度一正一反,此强彼弱,针锋相对,因此,网络不会同制度在某一方面重合。本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突显出网络的“独立”的。

部生成过程,找到其若干特征和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从社会学角度对地下经济的研究,可以成为透视网络生成的“关键个案”。

作为一篇以社会网络的生产为焦点的社会学论文,地下经济本身并不是本文的重点,从事地下经济的主体——社会网络——才是本文的研究对象。这个网络即存在于2000年9月被河北省当局查获的藁城市增村卷烟制假案中。<sup>①</sup>增村案涉及众多类型的社会网络及其生产过程,从而为我们从动态而非静态的角度观察和分析社会网络的生产活动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观测点。本文的主要资料就来源于相关书面卷宗和对在案的15名增村制假者的访谈整理。

## 二、增村网络的建构

在增村案中,我们发现,实际上存在两种类型的建网活动,其中一种就是格拉诺维特曾经细致地描述过的,对之我称为“将既存的社会关系转化为工具性使用”,但在此案例中,还包含着格拉诺维特没有提及的“亲缘关系的工具化”。第二种建网活动就是“拉关系”,也就是无中生有的建构关系的活动。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增村制假网络建构的类型。

### (一)将既存的社会关系转化为工具性使用

在这种类型的建网活动中,展示出如下几个要点:一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或是天然具有的,或是历史地形成的,总之,是已经存在的;二是这种关系原本是非功利性的,但在建网过程中却将之进行了工具性转化。

#### 案例1.利用血缘关系:周家三兄弟

增村的村民周振景、周景会和周振会三兄弟共同入股是增村案中利用血缘关系的一个典型。周家三兄弟都是增村村民周新申的儿子,周振景排行老三,周景会排行老四,老五是周振会。三兄弟中最早在烟机上入股的是周景会,然后周景会又带动了弟弟周振会和哥哥周振景加入到制假网络中来。

在今年春节的时候,大伙在一起歇着,说弄烟机,可是,一直等了一个来月也没有弄起来,我也没钱入股。后来,陈小路对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人,让他出资,你出面干活,行不?”我一想,这样不错,就同意了。

在和陈小路谈完这事儿以后,我回家找我爸商量让振会跟我一块干。我爸挺害怕,说烟草局的老来查,查住可咋办,我说不用咱们自己出钱,别人出钱,咱们出面,出了事也赔不了钱。振会也该娶媳妇了,别人能挣钱,咱们也能挣。

我本来没找我三哥,后来他知道这事以后来找我也想算股。我以前因为结婚的事跟他和三嫂闹过别扭,不愿意跟他们共事,可是禁不住他老来找我,我也就同意了,让他拿出1万块钱跟我一块算个暗股。这样把他也算进来了。

血缘关系在这种以获取非法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网络建构中往往得到普遍使用。其原因如下:第一,增强安全感,降低风险性,利用血缘关系能够有效地提高网络连接和扩张的安全系数,有效逃避外来的打击。第二,从盈利的角度看,血缘关系的利用充分显示出“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亲情作用。第三,从网络权力上看,利用血缘关系也有利于建网者扩大自己在整个网络中的地位,加重自己的份量。

#### 案例2.利用姻亲关系:常新占和妹夫李会军

姻亲关系在网络构建中的利用实际上可以被看作为利用血缘关系的延续。在获取利益和降低风险这两项功能方面,这两种关系的作用也大抵相同。

在增村案中,身在增村之外的李姚村的李会军能够通过常新占而入股就完全依靠的是他们的姻亲

<sup>①</sup> 增村位于其所在县城北部三县交界处,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条件便利。有十多年的卷烟制假历史,最早为手工作坊式的小规模制假,1995年后逐渐发展成为生产手段先进、产量巨大、组织结构严密、抗打击能力极强的网络式团伙制假活动。

关系。李会军是常新占的妹夫，他们两家的关系比较密切，所以在李会军想入股的时候，常新占非常尽心尽力。

李会军在卷宗里这样供认：

2000年8月底9月初，我是给俺小孩舅舅常新占说的，我想入个股，俺小孩舅舅常新占说：“算了，你拿出9000块钱，加入俺们的班吧。”后来我就给了新占钱，入了他们的班。

这个过程与常新占说得相当吻合，常新占说：

8月份合机子后，李姚村李会军找到我说想入股，我让他给了我9000块钱，他算暗股，我和李会军算一个明股。合机子后我一共分了4000块钱，我还没有给李会军呢。

**案例3. 利用同乡关系：网络的组织者刘振生和同乡杨中华**

如果一种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而又带有地下性质的网络只建构在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的狭小范围内的话，此种类型的网络是极为脆弱而易断裂的。因为虽然这种活动的性质需要极度机密，但是活动本身却很难做到在所有人的眼前遁形，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活动又不得不公开，正如制假者赵振国所说：“这么大的机器车接车送，还要不停地进料，拉货，村里人不可能不知道。”因此，利用同乡关系形成一个更大范围的“利益共同体”就成为必要。

杨中华是增村案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他一个人就负责牵头组织了2台烟机。按照增村案中其他成员的说法，当着村干部的杨中华是村里数一数二的见过世面的“能人”。关于他参与到增村制假网络的过程，杨中华作了如下叙述：

2000年过年的时候，振生来我家拜年，我俩是一代人（即同辈人），振生也参过军，也正干着买卖，我俩平常来往就挺多。他来了以后说：“中华，跟你商量个事，你看行不？”我说：“啥事？”他说他原来的机子要散伙，要找人入股，另外还有个战友在湖北那边弄烟机子，最近那边查得紧，不好干，想挪到这边跟他合伙干，问我想不想一块干，挣钱快。我是个老党员了，知道这是犯法的事，可是又想多弄点钱，村里干屠宰的越来越多，钱不好挣了。我就答应他了。说好先在原来的机子上干，我俩就分头出去找人入股了。

我找的是杨振祥、我弟弟杨小三他们，刘振生找的是赵振国、郭新喜他们，大伙都是乡里乡亲的，谁有钱谁没钱，可靠不可靠我们心里都有数

**案例4. 利用同学关系：热情的周振会和他的同学王建设**

虽然同学关系在增村网络建构中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并且大多被同乡关系掩盖，但是笔者还是找到了一个能够突显出同学关系的例子：即周振会为了帮助从前的高中同学王建设尽快挣钱结婚而把他介绍到增村制假网络中。

有一次，建设跟我说家里想给他定亲，说那姑娘不错，就怕家里没钱娶不到手，半道再跑了。我也为定亲的事着急，家里都是穷得慌。又琢磨不出一个挣钱多的活儿。再后来，我这不是跟着我四哥干起了做假烟的活儿嘛，我觉着挺挣钱，就赶紧跑到建设家让他拿出钱来入伙，建设还不知道这活咋样呢，我那时什么也不知道，就知道能挣钱，建设挺动心，过了几天凑了1万块钱，就给我送去了。他这个钱也是东家借西家借才凑齐的，人家对他横竖不放心，老催着建设还钱，我们俩自己也不知道多长时间能把钱挣到手，人家催得紧，建设跟我一商量，还是把钱撤走了。

**案例5. 利用以往同事关系：“倒霉”的周志会和其“同事”孟敬山**

增村案中同事关系的利用比较特殊和偶然，因为对于当事人周志会而言，这是一个被迫接受的“同事关系”。

我觉得冤枉。公安按市场真烟的价格给我们定的罪，我名下的股按3万2千块钱算的。其实里面还有别人一半的暗股。我一开始没交代，后来交代，他不承认，公安也没抓他，全算我头上了。

这个人 是西姚村的电工,叫孟敬山,我原来在增村当电工。县里经常举行电工培训班,我们俩就认识了,关系还行吧。都是同行。

7月份因为闹意见从第一台烟机撤了股,到刘振生找我再入股的时候,我正在培训,没在家。是我媳妇给我打电话商量这事的。我说入就入吧,当时也没在意。后来老孟突然问起我这事,说听说我们村弄机子挺多的,到底挣不挣钱。我还犯嘀咕,他怎么突然问起这事来了,我没跟他说,老孟就说你也甭瞒我了,我听见你打电话了,你不正弄这事呢吗?他说你算我一个,我说我还没决定入不入呢,他说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跟你们挣钱。我说一股4万块,他说一人一半。我想这样也行,省得我拿那么多钱。老孟说现在手头上拿不出来,先给我1000块算定金,过几天凑起来了就给我送去。我也没别的办法,只好答应了。第二天,他给了我1000块钱,我给他打了个收条,就算把他算进去了,这事除了我们家,谁也不知道。后来他老也没送钱过来,我催他好几回,他总说还差钱呢。结果到了9月份,机子就出事了。

#### 案例6. 利用战友关系:杨中华眼中的一对战友——刘振生和冯志军

在增村案中,战友关系是整个网络建构的前提。正是战友关系把河北省藁城市增村这样一个小小的村庄和南方卷烟制假的团伙连在了一起。这就是增村刘振生和湖北冯志军之间的战友关系。由于两个当事人都不在案,所以对这个案例是通过第三人杨中华的叙述而了解的。

刘振生的那个战友是湖北荆州人,叫冯志军。振生跟我讲,他俩都在山西当兵,是一个班的,关系比较好,他们俩常有往来。振生找我之前就和我们村的陈小路两人合伙干过,跟他们联系的姓马的广东人就是冯志军给介绍去的。他们那台机子不久就闹了意见,陈小路不干了。后来,刘振生说冯志军觉得那边不好干,想把机器都挪到这儿来,让我搭伙。

冯志军在正月来过一趟,在石家庄请我和刘振生吃了一顿饭。他属猴,比我小5岁,长得挺精神,一看就是个见过世面的人。

我们买的机子就是冯志军给牵的线。

#### (二)“拉关系”:“无中生有”的关系建构过程

由于其自身的“地下经济”性质,有些问题比如怎样同烟草部门进行有效周旋等是上述这些既存关系所不能解决的,因此仅仅将既存关系进行工具性转化并不足以保证网络的正常运行,还需要有第二种建构网络的形式,即从无到有建立新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的“拉关系”。

下面,我们借助就这一问题对杨中华进行的访谈来看一看从无到有建构关系的三个过程:信息搜寻、虚拟连带和工具性转化。<sup>①</sup>

##### 信息搜寻

有了制造假烟的机器,有了原料供应点,有了制成假烟的销售渠道,有了十几个共同入股的“利益共同体”,这个制假网络是否已经足够完备了呢?

杨中华说:“还不够。”

自己独立办厂的杨中华深知来自“制度”方面的压力:

我问过刘振生跟上边有没有关系,因为村子里的事我能管的就管了,政府方面的事我可顶不住。振生告诉我说,听人说一般公安是不会直接来查的,大部分出事都出在烟草局和工商局,主要还是烟草局查得比较严。我们商量怎么着也应该找一个在烟草局上班的人当“靠山”,有动静也好通个气。振生说他不认识,当时我也没想起来谁。过了几天,我原来的同事来我们村走亲戚,到我家来坐了坐,说起来原来他弟L某在烟草局的网点卖烟呢。过完年我就找到他,说有人托我买点烟,就跟L某见了一面。我们两个人算认识了。后来我把L某单独约出来吃饭,把这事跟他说了,让他作中间人找一个能顶事的人。

<sup>①</sup> 这一问题非常敏感,我进行了两次访谈才收集到资料,并对两个当事人使用了化名。

过了没几天, L 某就给我打电话来, 让我过来和 W 某见见面。我心里就有数了, 这事就算成了七八分了。

通过信息搜寻, 寻找到目标人物的亲缘或社会关系网络, 一种全新的关系就逐渐开始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轮廓。

#### 虚拟连带

理清关系的脉络后, 经由中间人与目标人物建立起一种虚拟的亲缘或社会连带就成为必要。

L 某说, 他跟 W 某说我是他哥的好朋友, 有点事找他。

于是杨中华和 W 某虽然还没有见面, 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围绕着 L 某就已经建立起了一种虚拟的连带关系。

见面后, 杨中华邀请两人去吃饭。在饭桌上, 他以 L 某哥哥的好朋友的身份讲了一些事, 并适当地夸大了自己和 L 某本人交往的情况, 争取找到和 W 某之间的共同话题。三个人都是场面上的人, 又是在酒桌上, 很快就熟了起来。最后杨中华试探着挑明了自己的真实来意。

实际上, 信息搜寻本身就是通过既存的关系一波一波传递下去所完成的, 在这种已经存在的真实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一种虚拟的连带关系是比较容易的。问题是要想办法把这种“虚拟”关系变得牢固, 关键就在于要善于利用自己与目标人物之间的纽结——中间人的作用, 并且要时时察言观色, 避免在不恰当的时候说出不恰当的话语, 从而导致虚拟连带关系的断裂。在这一点上, 杨中华做的相当好, 他顺利地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来意。

#### 工具性转化

建立虚拟连带关系当然不是“拉关系”的最终目的, 把虚拟连带关系做实, 从关系中实现双方利益的互惠, 这才是从无到有建关系的真正含义。我们接着上面的案例来看从无到有建关系的第三步, 即工具性转化的过程。

在杨中华挑明来意后, W 某当即拒绝了他。但杨中华并没有灰心, 因为这是他意料之中的事。

我知道 W 某一定是害怕把自己卷到里边去。我们找他也就是为了让他给我们透透消息, 他又不是官, 还能干啥?

我跟他说就是想让大伙合作多挣点钱。他也知道干这种买卖的不只我们一家。看着别人拼命的捞钱, 自己不干不就成了傻子了? 我说了, 他不用帮别的忙, 就是看烟草局有什么动静提前给我们通个信, 也就是打个电话的事。我俩以前又不认识, 谁能知道? 就是万一出了事也没他的事。L 某也在旁边帮着说。

在 W 某渐渐打消疑虑之后, 杨中华又开始进行物质上的诱惑。

我开始说每个月给 W 某、L 某每人 1000 块钱, 还分给他们两个空股, 不用投钱, 到时候等着收红利就行了。不过 W 某这个人挺毒, 嫌少。没办法, 谁让咱得求着人家呢, 后来我给加到了 2000, 这个数就不少了, 他就同意了。

于是, 杨中华和 W 某之间的虚拟连带关系就此做实。

由上面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 在将虚拟连带关系做实的过程中, 又大体分成了四个步骤: 坚拒——动摇——讨价还价——成交。整个过程实际上是双方不断进行自身利益权衡的过程, 双方相互清楚对方的要害, 也能摸清对方的底限。只有双方都能从这种做实的商业关系中得到满意, 这种商业关系才是有效的, 我们也才可以认为一种真正的关系被从无到有地建构了出来。

#### 小结

就增村案中建构网络的各种关系而言, 他们之间有强弱之分, 亦有先后之别, 并且各种关系的使用各有其限定范围, 在建网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也各不相同。

利用战友关系和利用虚拟连带的方式从无到有建构起来的商业关系, 虽然数量极少, 但是在增村制假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却是不可替代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 没有这两种关系就没有整个网络的产生和发

展;大量存在的血缘关系、姻亲关系和同乡关系,构成了网络的主体,使网络能够由点及面地成长,最终有血有肉地建构起来;同学关系和以往的同事关系在网络建构中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只是作为两种真实存在的关系类型才被提及。

### (三)网与物:物作为建网的依托

以往的社会网分析大多都是直接对网络进行观察,认为社会网的规模似乎可以没有定限,社会网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层层连接,有多少层关系,就有多大规模的社会网络。但在增村案中我们却发现:社会网的规模是被一定的物所限定的,即是说人与人的连接是以物作为基础的。这里所指的物包括了烟机、建网所需的资金、原料和销量。它们作为该社会网络的基础决定了网络的规模。

烟机是增村制假网络的最核心的物,其他的物比如资金、原料等则是围绕烟机而出现的为整个制假活动所必需的元素。我们所说的网络的规模指的就是这些物所能够承载的关系的数量,也就是说,一台烟机从集资购买到开始运行的这一段时间里所参与的人数确定了这个网络的大小。

为了能够更加清楚地表明增村制假网络是以烟机等作为物质基础的,我用下面的图形来说明增村制假网络的结构(虽然本文研究的主要是生产网络,但为了提供一个整体印象,还是把原料供应网络和销售网络列了出来)(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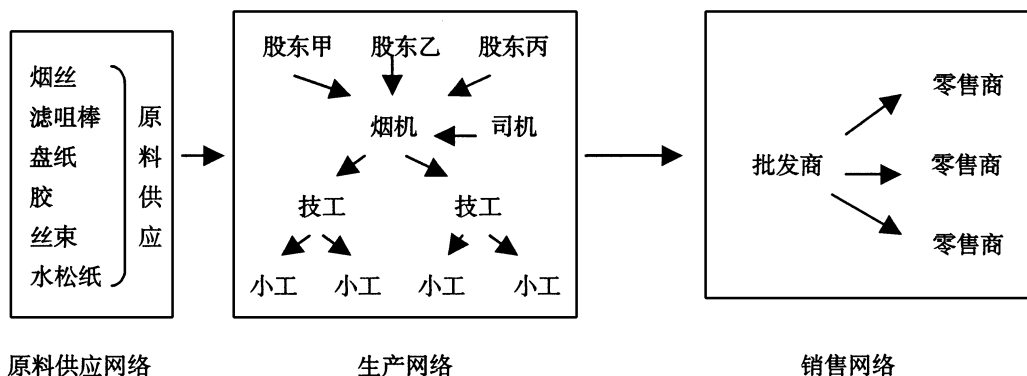


图 1

从图 1 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增村制假网络的整体结构,并且再度确认了一点:增村的制假网络是以烟机等作为依托的,这些物限定了网络的规模。一般来讲,增村的一个制假网络平均维持在 20 个人左右,其分布大致如下:

入股集资购买烟机的股东:10—15 人;

负责烟机维修的技术工人:2—4 人;

平时在烟机上干活的小工:6—8 人。

其中,技术工人和小工的数量是由烟机的工作量来决定的,烟机的工作量大,就需要比较多的技术工人和小工;反之则数量减少。而股东的数量则是由购买烟机所要花费的资金和每股股金的金额共同决定的。比如说购买一台烟机需要 25 万元,每股股金 2 万元,那么平均算下来,需要 12—13 个股东。

我曾经问杨中华,为什么不把每股的股金降下来,比如说每股 2000 元,或者干脆他和刘振生两个人出资把机器包下来,找人干活,只付工资,不分红利。杨中华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让我们了解为什么每台烟机上构建的网络规模基本相同。他说,把每股的钱数算得太低不行。虽然这样自己需要投资的数目小了,但同时挣的钱也会以相同的比例下降,用他的原话就是“没什么赚头”,另外入股的钱一少,人就多了。人多一是不好分工,二是特别容易起争端,不易管理。至于让他自己出大头,他虽然有那个钱,却不敢冒这个险。

所以,网络规模太小则网络的安全性得不到保证,规模过大也不可行。在这两个极端之间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在这个点上既能确保可观的利润,又能把风险稳定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判定这个平衡点



的惟一依据就是入股的人能够承受的最大投资额。杨中华说：“一般的村里人也就是在2、3万块钱左右。”这个数字在其他参与者那里得到了印证。因此，按照烟机的平均价格25—30万元，再除以这个数字，所得到的数字也就是围绕一台烟机所能建构起来的网络的一个基本规模。

由上可见，增村的制假网络是一个以物作为依托的网络，其规模自然要受限于这些物质因素。这意味着网络的规模不会长期保持稳定，而是会随相关因素的变动而改变。因此，也就有了下面“扩网”和“收网”的问题。

### 三、增村网络的滚动式扩张

增村的制假网络在规模扩张上，大致有横向、纵向和总体三种扩张方式：

案例1. 以烟机增加为特征的横向扩张(如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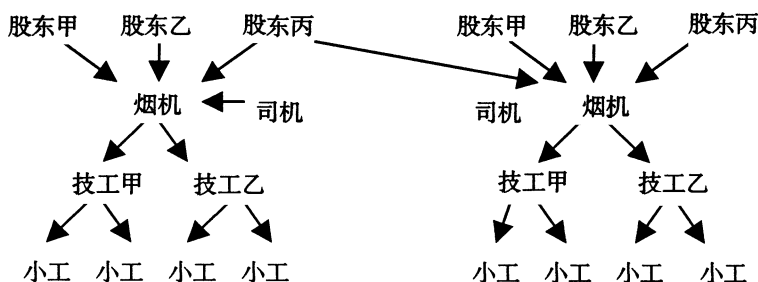


图2

增村案的卷宗里记录了这个非常典型的扩张案例：

2000年4月份的一天，刘振生、杨中华商量找几个人合伙购买烟机生产假烟。他们先后找到杨振祥、郭新喜等14人，每人出2万元，共集资30多万元，然后用25.5万元从本村周会清手里购买了一台旧的YJ14/23型卷烟机，开始生产假烟。在烟机正常生产后曾经历过一段低潮时期，经营状况非常不稳定，生意低迷，后来在6、7月份的时候，又由于意见不合，杨振祥、赵建辉、赵振国、周建民、周志会、郭新喜等6人撤了股，于是杨中华等8人继续干。不久，生意开始好转，杨中华、周振景等人感到一台烟机挣钱来的比较慢，便又想再弄一台烟机生产假烟。于是在8月份，周振景找到杨中华商量再找人合伙购买烟机，然后分头找人。几天后，周振景、杨中华纠集了周建军、周振会、杨小三、杨金利、杨振山、常文化、周建四、李永等11人，集合到周振景家商量购买烟机的事，说好每人先拿出2万元入股，共收了22万元，然后，杨中华、周振景通过一个姓徐的河南人从湖北襄樊用21.6万元购买了一台YJ14/23型的卷烟机开始生产假烟。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网络横向扩张的特点：那就是一人或多人在一台以上的烟机上投入资金。在增村制假网络中，一般情况下，烟机在开始正常运转后是不需要连续注资的。网络的横向扩张是参与者多点投资，扩大生产规模的结果。因此，扩张不仅表现在参与人员的增多，更重要的是网络的依托——各种相关的物质基础，如烟机、资金也会相应扩充。

案例2. 以人员增加为特征的纵向扩张

与以烟机增加为特征的横向扩张相比，以人员增加为特征的纵向扩张虽然在网络参与人数上有所增长，但是网络的物质基础却不会发生特别显著的变化，也就是说，这种形式的扩张基本上是股东在原有资金基础上的再调剂(如图3)。

当网络正常运转后，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网络的参与者们一般是不欢迎有新加入者来坐享其成的。但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则是例外。所以即使明面上反对新股东的加入，暗地里还是多出了许多暗股。允许这些暗股的加入或者是出于感情因素的考虑，或者是出于降低风险的需要。暗股的加入并没有给

网络带来新的资金,而只是分担了原有股份,并且暗股一般是比较保密的,除了参与此事的股东外,其他人很难知道此事,所以,网络的扩张是在悄无声息中进行的。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李会军是作为常新占的暗股,分担了常新占2万块钱股金中的9000块钱,再比如周建军作为周建四的暗股,分担了2000块钱的股金等等,至于是否还有其他未知暗股的存在,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以暗股的方式加入到网络中是以人员增加为特征的网络纵向扩张的典型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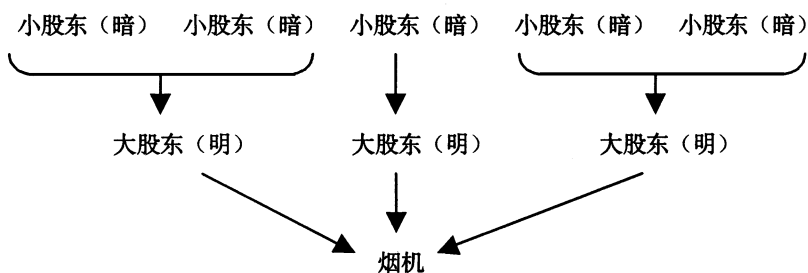


图3

以人员增加为特征的网络纵向扩张还有一个特点与以烟机增加为特征的网络横向扩张不同,即,这种网络扩张最常出现的结果就是以更多人的参与来分担同样的投资,因此可得利润非但没有增加反而降低了。

### 案例3. 两者的综合: 立体性伸展与扩张

第三种可能的网络扩张形式是以上两种扩张形式的综合:既有以烟机增加为特征的横向网络扩张,又有以人员增加为特征的纵向网络扩张,是一种总体性的伸展与扩张。实际上,在运转过程中,这两种扩张方式确实是在某些人的身上重叠的,但这只能算是在某一个点上的网络的立体性伸展与扩张,而作为网络整体,这种扩张的形式只有当网络的运转非常顺利,盈利状况异常好的情况之下才会发生。这种情况在现有资料中没有得到体现。但不难推断,如果增村案没有得到适时了断,而是听任其发展下去,那么,今天网络扩张的重要形式就很可能以这第三种总体性形式为主了。经由政府打击而导致的网络覆灭,彻底断送了这种可能。

## 四、增村网络的收缩

网络规模上的变化不只是向外扩张一种方向的活动,在某些条件下,网络规模会向内收缩。因此网络的发展和运作是非常具有弹性的,网络不会任意发展,而是经常做不规则的跳跃,不仅会有限度地扩展,也会有限度地收缩。

从增村案来看,造成制假网络规模收缩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 案例1. 网络经营状况不佳,产品市场价格下跌时对网络的影响

从2000年5月开始,全国部分知名品牌的香烟纷纷一而再,再而三地下调价格。我们知道,假烟之所以泛滥,原因就在于它的价格优势,一旦真烟与假烟的价格差距缩小,假烟在市场上的吸引力也会随之降低。以获取巨额利润为其根本目的的制假网络的规模自然也会因为这个重要的因素而有所收缩。

开始我们十几个人分三班干活,雇了8个小工。早、中、晚各三班,平均每天大概能生产一百件左右,好的时候能上到二百件,连轴转都忙不过来,还得临时把家里人叫来帮忙。后来,大概到了6月份吧,突然就觉着来料少了,我那时候想可能就是要烟的不多了吧。因为没那么多活,三班改成了两班,其实那点活一班就能干完,可是为了干活分红,还是匀成了两班,怕有人闹意见。小工也用不了那么多了,振生给退走了一半。有的时候实在没活了,或者赶上机器坏了,机器就那么空闲着。原来红火的时候,生产一件烟给我们加工费7块钱,8、9块的时候也有,但比较少。后来就只有5块钱了。我们一块凑股的人心里都犯嘀咕,是不是这事要黄啊。

本来我们算股加入进来,就是为了能多挣点钱。可没想到还有这事。

事实上,这种低迷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降价的做法使烟草市场一片混乱,不久烟草专卖局对卷烟实行了最低限价政策,即不能以低于限定的价格出售卷烟。增村的制假活动又重新活跃了起来,网络规模也重新开始扩展。

### 案例 2. 政府打击黑市对网络规模的影响

市场价格是影响网络规模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却不是惟一的因素。来自政府的打击,尤其是烟草专卖局的打假活动才是最致命的,严重的时候,花费几个月心血构建起来的网络很可能会在半个小时之内断裂乃至覆灭。

杨中华说:

5、6月份的时候,烟草局来查过一次。我们事先接到信儿,就把机器趁黑转移到别的村藏起来了。但是赵红根他们的机器被弄住了。

这事过了之后,我心里就害了怕。虽然有W某,但包不准哪天就把我们抄了。我那时没想到自己会判刑,以前他们都说只查机子不弄人。我就是想,机子要是被查出来,我入股的那些钱可就全没了。我自己在这两台机子上入了5万块钱。我弟弟杨小三入的股里有两万块钱也是我出的。我想我肯定退不出来,振生肯定不干,就想着让小三把股退了。我让小三说要干别的事急等着用钱去找刘振生退股。

那时候,这买卖也不好干,振生找来的活越来越少,已经有人退股了。小三去退股的时候,振生虽然不愿意,但他也知道这是我的主意,他也没办法。后来他还找我问我是不是不想干了,我说我们家的事跟机子上的事没关,让他别管这么多,我这不还占着股呢吗?他也就不说什么了。

### 案例 3. 团伙纠纷对网络规模的影响

对于一个需要多人参与才能构建起来的网络而言,这些参与者之间的团结程度也自然会成为影响网络规模的一个重要因素。增村制假网络也不例外。

纠纷出现在假烟生产由三班改为两班之后。由于活少,有时一班就能干完,另一班相对来说能干的活就没有第一班多,挣到的加工费也就跟着减少。利益受损的这班在杨振祥的带领下就去找周建军那班理论,两班吵闹不休,刘振生只好出来调停,让两班轮换着先干,两拨人虽然都觉得不满意,但又都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也就同意了这个做法,暂时算把这场纠纷压了下去。可是几天之后,更大的矛盾出现了。周建军等人认为由周志会负责进的原料有问题,质量次,根本不值他报的那个价钱,这把周志会惹火了,两派人又打了起来,怎么劝也劝不住,结果周志会几个坚决要求退股。刘振生看到两拨人实在是合不来,也没有了办法,只好把周志会他们的股转到了另外一台机子上,从这台烟机上给他们退了股。

团伙纠纷相对于前两个导致网络规模收缩的因素——市场价格下跌和政府打击——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应付的。因为团伙纠纷极少能动摇网络的根基,它只是网络中各点利益分布不均的结果。因此,虽然在形式上团伙纠纷对网络规模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但是在本质上,网络所受到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轻微的。

## 五、结 论

长期以来,对于动态的社会网的过程研究一直被大多数学者或多或少地忽略着。毫不讳言地说,如果过于偏重于结构分析的社会网络研究照此路径发展下去,只会越来越僵化。透过对增村案的分析,本文发现,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社会网络实际上是将建构、扩张和收缩集于一身的完整动势过程,而关系网络的规模也并非随心所欲,而是以一定的物作为依托的。物的变化会改变网的规模。由于内外约束条件的变动,网络或者扩张,或者收缩,其所呈现出的动势特征已非结构分析所能完全把握。应该说,动态

的网络分析是一个值得被给予深入、长远的学术探讨的议题。

参考文献：

白春燕, 2000《社会资本的再生产: 技巧与策略》,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论文。

福山, 1998《诚信》, 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方壮志, 1995《社会网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总第25期。

齐美尔, 1922《群体联系的网络》。

万安培, 1994《中国地下经济现状的理论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第1期。

法伊格等编著, 1993,《地下经济学》, 上海三联书店。

肖鸿, 1999《试析当代社会网研究的若干进展》,《社会学研究》第3期。

Butt, Ronald E. 1983, *Corporate Profits and Cooptation, Networks of Market Constraints and Directorate Ties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New York: Academy Press.

——1992,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leman, James S. 199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Supplement), 8 Vol. 94.

Granovetter, Mark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1974 *Getting A Job: A Study of Contacts and Caree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1, no. 3.

——1992 “The Sociological and Economic Approach to Labor Market Analysis: A Social Structural View.” in M. Granovetter & R. Swedberg (ed.),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Western View Press.

Lee, Harvey 1990 *Critical Social Research*, London.: Urwin Hyman Ltd.

Lin, Nan 1982, “Social Resources and Instrumental Action.” In Peter V. Marsden & Nan Lin (eds.), *Social Structural and Network Analysis*, Sage Publications.

——1999 “Building A Network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Connections*, 22(1).

——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orenson, Olav & Toby E. Stuart 2001, “Syndication Networks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6 no. 6.

Yang, Mayfare Mei-hui 1994, *Gifts Favors & Banquets: The Arts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wedberg, Richard 1987, “Economic Sociology: Past and Present.” *Current Sociology*, vol. 35(1).

——1992,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Sociolog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 2000 级硕士生  
责任编辑: 罗琳